



01

将分享经济融入新型城镇化

诸大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新业态，特别是作为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式，要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融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一方面是因为城镇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密度大、人均空间小，用于储存私人物品的空间也相应较小，因而居民对通过社会化平台分享物品和服务有较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我国城镇发展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变的过程中，分享经济在促进提升城镇发展品质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在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具体来看，积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减轻城镇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二是促进城镇发展更加高效、包容；三是推动城镇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2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入“下半场”

吴志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人的根在乡村，只有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提升，才能完成中华民族进入城镇化的新时代。农村是提升城镇化品质的重要保障，不能简单地把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而是要把城市治理好，把农村振兴起来。现在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级制度三种制度性障碍。如果这些制度性障碍不解除，乡村振兴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未来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双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赋予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时代内涵。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一跃，必须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这就需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工尚未成为市民，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到位，劳动力供给不稳定，问题解决的关键是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的前半段，中国人以勤劳的劳动力推进，为体力城镇化；而后半段应该由智慧创造力来推进，为智力城镇化。勤劳和智慧的中国人民，将完成5000年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变革。

03

乡村振兴不能靠工业经济思维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乡村如何发展，这是当今世界性的话题，也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一个重大战略。因此，我们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要加一个定语“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抓手。然而，国际上难以找到可参考的经验，我们已经进入了“无人区”。如何让一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是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新课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下，要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现代化应该走什么路、以什么为根的问题。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不是单纯的城市化、工业化，应该是以乡村文明为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千万不要以建设城市的思维搞乡村建设。特别在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城市与乡村发展失衡背景下，继续走单极化城市化将会给中国带来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和环境危机。乡村振兴战略是未来乡村本身发展的战略，是有着重要时代意义的战略。乡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乡村振兴问题是国家全局的问题，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方略的大调整，这是从单纯的城市端发展战略向乡村端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要把乡村生活变成城市人需要、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价值更高的生活方式，乡村产业发展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必须做，那就是搞以村为单位的全域有机农业。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即乡村文化复兴是灵魂，乡村治理是前提，乡村生态环境修复是基础。这三件事做好了，就像有了良好环境与肥沃土壤一样，种下种子一定会有收获。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乡村产业，必将水到渠成。

04

走出“单体城市” 推进大都市圈规划建设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结合中国国情和城市发展道路，目前在空间规划上已初步形成了八个主要层级，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是乡村规划、小城镇规划、城市规划、大都市规划、大都市区规划、大都市圈规划、城市群规划和湾区规划。但由于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不仅这些概念的内涵和边界不够清楚，在实际的规划和建设中也带来诸多不便和混乱。与大都市圈关系最密切的是相邻的大都市区和城市群。从目前的总体情况看，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城市群规划已比较成熟，国家级的已经发布了8个。同时，由于近年来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不断强化，大都市的规划一般都会给周边农业地区一个重要位置，所以大都市规划实际上也已悄然演变为大都市区规划。而唯独在空间上“比大都市区大”和“比城市群小”的都市圈规划，在概念内涵、空间边界、功能定位等方面都比较含糊不清，成为我国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弱项”和“短板”。与世界主要的大都市圈相比，我国大都市圈尚未形成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大都市圈内部的城市层级、合作机制、协调发展等都尚未培育出来。都市圈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单元，也是加速提升综合国力的巨型引擎，决定着我国未来区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形态和总体走向。🏠